

本报记者谢云挺

# 解码浙江「村域小城市」试点

培育“村域小城市”是浙江提出的新概念,意在给具备小城市发展实力的特大村赋能,助力推动村庄农民实现“城市梦”。目前,浙江正在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开展村庄建“市”实验,他们怎么做的?进展如何?又碰到了哪些问题?记者对此展开调研。

## 特大村的期盼

花园村的发展引人瞩目。这个距东阳市城区17公里的村庄,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个只有0.99平方公里面积不足500人的穷山村,人均年收入只有87元。如今,工商业发达,花园村集聚了6.5万常住人口,村域也由两次并村扩大到12平方公里。全村年营业收入逾600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3.5万元。

走进花园村,高楼与别墅群错落式排布,街道车水马龙。这里有99米高的大型酒店、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花园商业中心、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市场,还有高标准建设的学校、医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游泳馆、体育场,以及浙江首个以村为单位创建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等公共基础设施,为花园村民提供高水平的民生供给。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花园村舍得不间断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村庄公共服务体系,驱动力来自村民的“城市情结”,而产业兴旺让村集体经济有实力投资建设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据介绍,村里的花园集团拥有50余家全资和控股公司,涉足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五大板块,年营收逾300亿元,还有个私工商户3700余家,2019年,花园村缴税超过3亿元。

“以花园村现在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社会发展的水平标准,已经具备小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实力,勃发出先发优势。但是,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遇到村级定位的许多限制。”花园村党委副书记金光强说,比如,受传统村级管理体制、发展空间等限制和约束,难以推进就地城市化的规划和建设。“花园村期盼政府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城乡鸿沟,推动花园村做大做强,建成第一个‘村庄都市’”。

东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爱忠说,花园村是“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和“中国十佳小康村”,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201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花园村的“村域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全省乡村振兴综合改革的重头戏给予支持。要求大胆创新,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探索特大村农民市民化跨向“村域小城市”提供新模式。

## 村级市政“大管家”

2020年6月28日,全国首个村级市政管理委员会在东阳市花园村挂牌成立。记者了解到,该市政管委会是花园村试点建设“村域小城市”的创新举措之一。下设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处、电气管理处、供水管理处、绿化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督查处等7个部门。

“这个市政管委会是花园村城市化建设的‘大管家’。”花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邵钦祥说,管委会所有工作人员身份都不是政府公务员,是从全体村民中选拔担任。

记者调研梳理出花园村城市化试点工作有四个重要环节的创新。

一是在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上,建立花园联合党委,下设花园村党委、花园集团党委和花园两新党委的党组织设置体系。探索在市场、楼宇内组建党支部,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

二是创设市政管委会,在花园村党委、村委会领导下做好村域范围市政管理工作。

三是支持探索放开花园村落户限制,方便已在花园村实际居住人员落户,提升人口集聚吸引力。同时,改革调整村级管理制度,包括缩小居住证持有人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公共服务和待遇方面差距,吸引外来人员居住创业,以及相关事务办理不以户口为主要认定标志,促进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等。

四是在省级层面支持花园村按照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和方式,高标准编制适应“村域小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空间利用、环境功能区等规划。支持花园村率先开展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为花园村小城市发展创造条件。

记者注意到,浙江省把花园村试点定位在“村域小城市”,这样,既能兼容村庄与小城市两种特质,同时规避了行政级别的问题,避免产生歧义。并且,列出重点项目和改革清单。比如,花园村民关心的房产是否可以买卖问题,允许按照城市标准落实花园村不动产确权登记,探索跨区域交易。

当地一些村民反映,正在推进的花园村小城市建设,吸引了周边村群众要求并村加盟。据了解,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花园村,多年来辖区村民可享受有31项福利待遇,让其它村庄羡慕和难以企及。这次小城市试点,种种利好叠加,又进一步强化了花园村的吸引力。

## 从花园村改革看特大特强村发展之路

最近,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花园村的花园集团以第304位的排名再度上榜,与2019年排名相比,上升了10位。

记者调研发现,全国不少产业兴旺实力雄厚的名村,往往都有一个威望高、能力强的“领头雁”。他们既是企业家,也是村党组织书记,就像花园村的发展,与花园集团企业家邵钦祥的名字连在一起,在他带领下,把“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的穷山村,发展成“花园村里似花园”的强村特大村。目前,全国有一批像邵钦祥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引领村庄振兴图强,其村庄综合实力已超过一般中心镇,如何让这批有先发优势具备小城市发展实力的强村特大村进一步做大做强,也是浙江呼应花园村要求赋能,推进花园村城市化改革试点的用意所在。

目前,花园村的“村域小城市”试点已进行了近半年多的探索实践,成效初显。记者注意到,花园村城市化改革背后,承载着村民对市民身份的渴求。他们在经济“翻身”后希望打破城乡鸿沟,让村民不被标签化。从试点情况看,目前碰到的主要问题是,改革后的花园村该叫什么名,也是当地群众关注的话题。如果城市化后还叫“花园村”,当地村民心有不甘,但“村改市”又不符合法律规定。

东阳一些干部群众说,著名的华西村也曾为村名困扰,后来,经江阴市政府批准,华西村正式更名为“华西新市村”(《新华日报》2011年6月10日报道),与一般的村庄区别开来。他们认为,花园村也可以借鉴“华西新市村”取名为“花园新市村”,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能展现改革成果。

浙江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特大村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助力花园村诞生孕育第一个“没有一个公务员的‘村域小城市’”,符合特大村发展之需和群众所期所盼,是统筹城乡体制机制突破的标志性改革,具有首创意义,有利于为高水平乡村振兴探索新路子。

# 江苏扁担村,“穷扁担”变“金扁担”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扁担村一景(9月27日摄)。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朱筱)秋日午后,走进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扁担村,入眼便是一条似扁担般狭长的潺潺河流,在暖阳照耀下波光粼粼。63岁的村民张红正在家门口打理菜地,时不时地照看下自家经营的小卖部,忙碌中透着一份惬意。“这几年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修好了,环境变美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扁担村地处淮安、连云港、宿迁三市交界,区位偏远、地势低洼、交通不便,一度被称为“穷扁担”。近年来,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该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稻虾养殖、瓜蒌种植、蚕桑种养等产业,“穷扁担”成为一头挑起绿水青山、一头担起金山银山的“金扁担”。

在村里的一片水产养殖场内,水清岸绿,一排桃树环绕周围,几处喷泉点缀其中。养殖户丁娟正忙着包装刚捕捞上来的螃蟹,“蟹遇桃花”的包装盒令人耳目一新。丁娟原本在北京工作生活,去年回到家乡承包了68亩蟹塘搞养殖,打造一片

# 山东“小西藏”有一条振兴“天路”

现在一年收入抵过去10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空置多年的石头房修缮一新后还能变成“金房子”,以前村子、房子都是空的,现在都活了!

新华社济南10月20日电(记者张志龙)盘曲的环形山路,如一条巨大的银色项链,挂在群山之中,颈项处便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小山村——临朐县淹子岭村。“一脚踏四县、鸡鸣闻三市”,海拔800多米山村,素有山东“小西藏”之称。如今的淹子岭却因为它的脱贫与振兴成为网红:一条被百姓亲切称为“天路”的山区公路嵩山一号大道,让以往坏在树上烂在地头的山货走出深山,秀美的山区风景,更引来四方的游客。

记者驱车走在嵩山一号大道上,公路两侧的佛手瓜秧像地毯一样铺在了山坡上,瓜秧底下硕果累累。山间秋日的红叶和黑树枝上的红柿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透亮。正值秋收时节,沿途百姓脸上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同行的嵩山生态旅游区党委书记王楷说,这几年淹子岭村发展进入快车道:临朐“全域旅游”发展成了可以凭借的“东风”,惠及嵩山10多个建制村13500多人的“天路”建成通车,发展“乡村游”让原省定贫困村摘了帽。如今,全村38户,已有20多户买了私家车,村里还专门建起了停车场……

几年前,记者首次淹子岭村之行犹在眼前:五道山梁夹着三条深沟,山路崎岖旋转,石屋风蚀雨琢,老村破败不堪……全村仅有的一辆送货用的老面包车停靠在村委大院,落寞中透着萧条。

“以前的日子真不好过!”淹子岭村60多岁的王庆书回忆过去一脸愁容,原先俺村路难走、缺水,赶集要走20里地,桃

# 辽宁保护性耕作换来玉米好收成

新华社沈阳电(记者邹明仲、余之臻)金色十月,秋高气爽。辽宁黑土地上一片收获的忙碌场景,在铁岭县蔡牛镇的一片玉米地里,一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收获一个个金灿灿的玉米。

铁岭县蔡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玉国说:“我们今年种了3万多亩地,大部分是玉米。玉米亩产1400斤左右,还算是个不错的年景。现在秋收正忙,大约完成了90%,剩余部分预计很快就能完成。”

虽然铁岭县在6月下旬至7月底遭遇旱情,但农户在政府支持下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降低了影响,后期雨水及时补充,有了不错的收成。

记者采访了解到,还有一部分玉米种植农户,通过种植方式的变革,达到了稳产的效果。“我种了5000多亩地,亩产1400斤左右,亩产和往年比差不多。”昌图县亮中桥镇种粮大户盛铁雅说,“多亏用了保护性耕作模式,才有了今年这来之不易的好收成。”

记者了解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农民耕种前,玉米秸秆



▲扁担村一景(9月27日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王昊摄)

心中的“桃花源”。

丁娟说,她承包的蟹塘目前总产量在1.2万斤左右,中秋节假日已经卖了三分之一,剩余的预计在重阳节前后售完。“除了养殖螃蟹,我还计划在附近承包300亩左右的采摘园,种植草莓、葡萄等水果,丰富业态。”

扁担村党总支书记范从伟介绍,该村靠近高沟镇的今世缘国家4A级旅游景区,村干部主动与该景区对接,发展乡村旅游。“不到3年时间,村里就发展起垂钓、农家乐、烧烤屋,每年可接纳游客10万人次。”

紧挨着一片水产养殖场,村民徐祝春承包了300亩瓜蒌产业园,一片片吊瓜藤上挂满一簇簇饱满硕大的果实。“瓜蒌是药食同源的食物,瓜蒌籽营养丰富,瓜蒌皮和根可作为中药材。”徐祝春说,今年瓜蒌亩产在300斤左右,每斤市场价在18元到25元之间,深加工炒熟后若按一斤30元算,亩产可接近1万元。

去年,临朐县又部署了“绿满城乡、秀美临朐”专项行动,投资1.4亿元组织实施道路绿化美化提升工程,努力实现“一村一特色,一路一景观”,打造出一条条“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景观大道。

如今,走进淹子岭村,一座座石头垒成的民宿掩映在绿树丛中,青石地面严丝合缝,新修的窗棂与原有的构件浑然一体,愈发古朴典雅,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现在一年收入抵过去10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民宿“隐逸雅居”的主人、49岁的村民李善霞没想到,空置多年的石头房修缮一新后还能变成“金房子”。“以前村子、房子都是空的,现在都活了!”

随着淹子岭村入选“齐鲁最美田园”,名气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后备厢经济”让村民们的玉米、熏腊肉、土鸡蛋等土特产供不应求。“过去打完谷子去赶集,3块一斤卖不出去;现在游客到村里买黑小米,10元一斤供不应求。”村民肖广玉自豪地说。

如今淹子岭上建起了“房车露营基地”,写生基地“旅游综合体”也已具雏形,以原始石头村落为载体的民宿和农家乐拔地而起。

乡村旅游投资方揽月岛公司负责人说,看中淹子岭,一是淹子岭的自然生态环境优,二是临朐的投资软环境好。“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房车、民宿等8天都是100%入住率。”

为促使当地农业产业化、产业规模化发展,扁担村村民集中流转了2200余亩土地发展瓜蒌、螃蟹和蚕桑等产业,同时还建立起4个农村合作社,带动21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约8600元增长到2019年的2万余元,2019年村集体收入为25.7万元,全面实现脱贫。

村民腰鼓鼓起来后,精神也要富起来。近年来,扁担村新建116平方米村史馆,建成占地800平方米包含21个功能室的综合服务中心,同时还组建起村级文艺宣传队,全面开展文化会演、科普教育、法治宣传等活动,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每天晚饭后,张红都会约上几个村民到村部广场跳广场舞,闲暇之余也会参加村里组织的锣鼓队。“过去我们村被称为‘穷扁担’,现在这根扁担挑起了全村人的‘幸福担’。”张红笑着说。

不顾家人阻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扔掉年薪60万元的“金饭碗”上山当起了“猪倌”。

第一眼见到王金涛,他身着灰色冲锋衣,中等身材,微胖,平头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不急不慢,给人印象敦厚稳重。熟悉王金涛的人说:他很倔,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但他也很敏锐,能吃苦,别人不看好、不敢做的事他能做成。

200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金涛成功入职广东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没过几年,他便进入了公司中高层,年薪60万元,成了令人羡慕的“金领”。

2016年,42岁的王金涛不顾家人、同事劝阻毅然辞职,回到家乡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在城市生活多年的王金涛敏锐察觉,优质猪肉市场紧缺,养猪可以一试。

“好好的一个研究生干啥不行。”“先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没经验没技术,怎么养。”“养猪‘水深浪大’,稍有不慎血本无归。”……

面对质疑,王金涛没有动摇,坚信只要养出好猪就不愁没人要,而当地的好山好水一定能养出好猪。

为优选品种,他背了一口电饭锅,从东北到海南,一路访一路尝,市场销量靠前的猪肉,都买回来用电饭锅清水煮来尝,最后确定的品种以藏香猪为父本、关岭猪为母本培育而来。

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和准备,2016年9月,王金涛的养猪场在六枝特区新场乡松坝村开张了,同时注册成立“二表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包括他在内2人,养殖规模为20头能繁母猪。

作为初学者,虽已做好“交学费”的准备,但王金涛坦言:“困难比想象中要多、要难,每年都要过一道‘生死关’。”

2016年,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光发电机就烧坏了20多台;2017年,近3成仔猪冻死冻伤;2018年底开始,受猪瘟影响,好不容易开拓的省外市场丧失殆尽,公司骨干人员流失。

最难受的是2019年,猪瘟影响下生猪销售仍然不畅,但王金涛顶着其他股东的反对和压力,执意将规模由500头扩至4000头,每天净支出近10万元。公司资金链几近断裂,最困难时账上只有100多元。

不少人觉得王金涛不是疯了就是傻了。但他认定,猪瘟会加剧优质猪肉供不应求的矛盾,只要做好防疫、改进养殖技术,猪瘟是可以避免的。

在逆势扩张的同时,公司建立了智能化防控中心,并与贵州大学专家团队签订了产学研技术合作协议,补齐技术短板。此外,还开发了腊肉、腊肠等新产品。

王金涛的坚持和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今年4月以来,公司接到的订单倍增,母猪规模也达到了5000头,一年能产10万头仔猪,今年预计可出栏仔猪6万头,产值近1.2亿元。

“能走到今天不容易但也很幸运。”王金涛说,创业至今政府帮了大忙,不仅修通了水、电、路,还在资金链快断裂时协调300万元贷款,并整合3000万元资金投入公司。

受益于扶贫政策的王金涛没有忘记肩上的扶贫责任。目前公司已在当地建设14个“养殖小区”,通过年底分红带动24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有120多位农民成了公司固定员工,月均工资3500元。

(记者潘德鑫)  
新华社贵阳10月20日电